王旭清．权威缺位与策略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100-108.
WANG Xuqing. Authority absence and strategy adjustment——research on the children rais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1）：100-10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1.012

权威缺位与策略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研究

王旭清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家庭教育不仅是主体及资源问题，也是权力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子代之所以难教，关键在于家庭教育权威的缺位。研究发现，新三代家庭结构很难培育教育权威。其中，子代外出的代际分工结构使合法性权威难以在场，教育出现权力真空；分权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使教育权力很难集中，代际配合困难。农民家庭因此出现了易养难教型、教养混乱型和有养无教型三种家庭教育类型。面对问题，农民家庭调整了教养策略。通过父辈授权、祖辈让权形成了“严祖慈母”和“台前幕后”两种新模式。也有家庭通过权力转移放弃了家庭教育，使家庭沦为有养无教的荒地。

关键词：农民家庭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权威；教养策略
中图分类号：G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1-0100-09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起着关键作用。打工兴起后，农民家庭很快形成了隔代抚养模式，留守儿童易养难教成为普遍问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抬升并且加大了教育投入，但是子代教养仍然难以避免教育主体缺位[1]、监管困难、辅导缺失等问题，甚至出现了“穷人家的富二代”、家庭教育去竞争化[2]等现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易养难教究竟难在哪里？家庭又会如何应对？

与城市家庭不同，农村家庭隔代抚养要面临亲子之间长期远距离分离和教育资源有限两大现实难题。对于教育资源问题，大量农民家庭正在通过进城来解决，典型如中小城市以及县城出现的陪读[3]。但对于亲子分离，农民家庭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隔代陪读仍然是许多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4]。目前，学者大多认为隔代照顾对儿童的影响是利少弊多[5]。从解释上看，一般研究都将隔代抚养问题归咎为主体问题，即祖辈不适合教育孙辈。之所以不适合，主要是因为祖辈能力有限，在知识水平、对现代技术的适应与了解以及时间精力上都很难满足家庭在孩子照料、监督和辅导等方面的需求。另外，“隔代惯”[5]以及代沟问题，使祖辈一方面很难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即使有心教育孙辈也无能为力。

进一步分析可知，主体归因表面上看是能力问题，其实暗含着资源与需求的适配逻辑。祖辈之所以不适合，是因为其拥有的资源无法满足家庭教育需求。具体而言，父辈在教育上很难被替代，是因为他们发挥着祖辈无法发挥的作用，比如0～3岁期间的信任与依恋关系建立，4～12岁期间的社会化引导[6]。而父辈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他们相比祖辈拥有更强势而优质的资源，比如年龄、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事物的熟识能力[7]等。但事实上，祖辈的资源并非完全不适配，而且资源劣势还有可能转变成动力优势，代际资源差异虽有影响，但未必决定教养行动和教养效果。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祖辈几乎半数不到六十岁[8-9]；祖辈出于代际关系的考虑反而对孙辈

收稿日期：2021-09-07 **修回日期：**2021-09-13
作者简介：王旭清（1994-），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E-mail：wxq20190628@163.com

教育更加主动负责[7, 10]；祖辈可以很快学会使用智能手机[7]。另外，祖辈如今大都返乡，经济与财务独立，工作时间灵活而自由。

其实，适配逻辑揭示出主体能力与资源禀赋的一面，却忽视了通过关系互动才能进行资源转化的另一面。首先，适配逻辑无形中对家长和孩子进行了主客分离，将教育视为一个作为主体的家长对作为客体的孩子单向实施的过程。但教育不是单向活动，而是双向互动，家长的资源禀赋必须经过有效转化才能成为孩子的养料。其次，转化的实现并不在于资源的多寡，而在于教育者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亲密关系、情感关系、信任关系，更是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孩子难教是主体及资源问题，也是权力关系问题。关键不在于祖辈不能教，孩子不听话，父辈一教就好，而在于教育权威是否有效。

已有学者分别对祖辈和父辈的教养方式进行了研究，均认为权威型或民主型要优于专制型和放纵型[5, 11]。但问题是，第一，这一类型划分几乎适用于所有家庭及教育主体，掩盖了农民家庭内在的结构性特点。第二，依然将教育作为单向过程，缺少对权力关系互动性的实践考察。虽然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民家庭形成了台前幕后的抚育模式和权力格局[7]，但并未对家庭教育权力的获得以及家庭教育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分析。

综上，笔者从权力的视角出发，认为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组成的“新三代家庭”[12]中，一代人的教养方式是三代人的互动结果。子代难教的关键在于，在家庭分工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下，家庭教育出现了权力真空，代际配合困难，很难形成教育权威。面对这一情况，农民家庭主动调整，通过父辈授权、祖辈让权与权力转移三种方式寻找和重建权威，形成了不同的家庭教养策略。

二、研究方法与经验呈现

笔者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10月分别在豫中两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总共访谈了68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从整体上了解了家庭教养的基本情况，随后共选取了6个典型案例深入接触，以此作为本研究进行分析的经验基础。

（一）村庄概况与农民家计

笔者调研的两个村庄都是普通农业型村庄，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村民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其中，祖辈（50后、60后以及部分70后）大都以村庄为中心半工半耕，男性以季节工为主，建筑行业居多，女性大都在家务农带孙子。父辈（80后、90后以及部分子代未成家的70后）则以长期外出务工为主，广泛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其中，40岁左右的男性以建筑行业、运输行业为主，30岁左右的男性则以工厂和服务业为主。40岁左右的女性大都在县城陪读，兼业务工，大都以计件工为主；30岁左右的女性出现分化，部分常年在外务工且以工厂和服务业为主，部分留在县城“半工伴读”[3]，以八小时正式工作为主，集中在餐饮、超市、美容等行业。最近三五年，两村皆出现教育竞争，不少村民从幼儿园开始就将孩子带去县城读书，小学转学进城成为普遍现象，也有村民将孩子送入寄宿制私立学校。从村庄舆论上看，乡村学校口碑日渐下滑，孩子进城上学成为一种潮流，也逐渐成为家庭能力的象征；中老年人普遍表示现在孩子不好管，“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你的”，而且在课业辅导上显得非常无力。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简介

在对村庄和农民家庭有了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笔者根据不同的家庭教养状态选取了六个典型家庭入户随访，观察其家庭生活并与家庭成员接触、单独访谈，单位访谈时间为1.5～3小时，随后再从学校补充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为保护隐私，文中均使用化名。6个家庭案例整理如表1所示。

三、易养难教：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

近年来，粗放简单的隔代抚养已经无法满足家庭教育的需求。受网络手机普及、乡村学校衰落、课业难度提升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孩子易养难教的问题，尤其是孩子进入小学阶段，特别是从中高年级开始，管教几乎成为所有家庭的共同难题。整体来看，在学业与课业辅导、习惯养成与规训、偏差行为管教这三大难题上，祖辈并非不想管或不能管，而更多的是无力去管，即使父辈参与也未必能够化解难题，反而会让局面变得更复杂。

表1 典型案例列表

编号	孩子	受访者	抚养人	家庭成员与基本家计
1	小新（12岁，乡镇中心小学上六年级）	爷爷（67岁） 奶奶（65岁）	祖辈	父亲（38岁）和母亲（36岁）在广东打工，爷爷奶奶在村务农打零工。弟弟8岁，乡镇中心小学三年级
2	小秦（8岁，县城公立小学三年级）	奶奶（53岁）	奶奶	父亲（31岁）和母亲（30岁）在广州做茶叶生意，奶奶在县城带孙子，爷爷农忙在家，农闲外出做建筑工
3	小安（4岁，农村幼儿园）	妈妈（30岁） 爷爷（53岁）	妈妈与祖辈	父亲（29岁）之前在广东做胶水生意，最近三四年在本地做电工。母亲在县城商场做柜台店长。爷爷奶奶在村里开小卖部，农闲时爷爷外出打工
4	小高（8岁，县城公立小学三年级）	奶奶（59岁）	奶奶	父亲（34岁）在郑州做服装生意，母亲（32岁）在深圳做美容。奶奶在县城小区做保洁，爷爷（57岁）之前农闲时做建筑工，生病后赋闲在村。哥哥13岁，县城公立中学
5	小王（11岁，县城私立小学六年级）	爷爷（77岁）	爷爷	父亲（41岁）一直在北京做装修。母亲（38岁）三年前去市里鸡排店打工。爷爷在村务农。奶奶去世。姐姐14岁，县城私立中学
6	小石（11岁，县城私立小学六年级）	爷爷（55岁） 奶奶（53岁）	祖辈	父亲（33岁）和母亲（32岁）在北京酒店做服务员。爷爷做建筑工，奶奶农闲时打零工。妹妹6岁，在乡镇幼儿园

（一）照顾易辅导难

学业与课业辅导是第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代际协调难。父辈对孩子学业的要求普遍偏高，而祖辈辅导往往难以达到父辈的要求，两代人又因为相距遥远或者沟通不良很难达成一致，从而出现了难协调的问题。比如案例中的小安虽然才上幼儿园，妈妈已经格外重视他的培养。有一次小安妈妈连续三天加班晚上没有回家，第四天发现小安的作业字迹潦草，她非常失望，并且表示老人看管根本无法满足她的要求，但她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自己回来重新纠正。

第二，家庭辅导难。这一难主要针对中高年级学生，由于孩子课业难度增加，祖辈往往很难辅导。小秦和小高奶奶以及小安爷爷都表示，孩子小一点还能看着写作业，大了之后自己根本看不明白。小秦和小高奶奶因此给孩子报了托管班和补习班。小安爷爷则开始在智能手机上学习如何教育孩子。而父辈又因为要上班，几乎也没有精力和耐心去辅导。比如小石妈妈正在考虑回家陪读，但之前她每次辅导孩子作业都会失去耐心，甚至对孩子大发脾气。她说自己本来脾气就不好，生活琐事就已经够她心烦，结果孩子还不顺心。

（二）亲密易规训难

规训孩子的行为是第二难。这主要涉及训练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基本能力，比如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饮食、作息习惯，引导他们正确用钱、学会交往，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等。从经验上看，虽然两代人都很疼爱孩子，与孩子也很亲密，但遇到需要规训的行为问题时就常常很无力。

首先，祖辈规训难。小王爷爷说，两个孩子常常提一大袋零食回来，饭不好好吃，整天吃辣条泡面。周末放假在家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不到吃饭时间都不出被窝。他成天说、成天跟在后面收拾，可两个孩子都不听。小高和哥哥的情况也差不多，奶奶就算吼他们，他们也只当耳边风，依旧看着电视不写作业。

其次，代际沟通难。由于两代人距离遥远生活分散，很难及时有效沟通，反而在家庭中制造出孩子躲避规训的空间。小石就早早学会了利用四个大人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父母不在家时，他一会儿找爷爷要钱，转身又找奶奶要钱，被发现就打谎圆过去。父母在家时，他事事听从父母，但转头就找爷爷要手机。爷爷奶奶只要不给他买东西，他就给妈妈打电话。而他想让妈妈回家时就又去闹奶奶。全家人都被小石整得团团转。

（三）唠叨易管教难

对偏差行为的管教就更加困难。与规训相对潜移默化的方式不同，管教往往需要通过适当的惩罚来进行。但现实是，即使祖辈平常总把规矩挂在嘴上，还是很难避免出现问题，而出了问题也很难管教。他们的惩罚对年纪尚小的孩子或许有用，但对开始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失灵。

比如小新这两年就格外喜欢花钱，甚至因为钱而多次情绪失控，顶撞爷爷。有一次他气冲冲地问爷爷“钱是我爸妈给的，你为什么不给我”？爷爷一时语塞，想了一会儿才回道“那你怎么不想想你父母为什么给我不给你”。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发生，爷爷深感心累，他说：“小的还可以打，管得住，大的现在长得只比我还高还壮，根本不服管。”小石就更加典型，有一次他玩手机不睡觉，爷爷奶奶拿他没办法，父亲知道后直接从北京赶回家揍了他一顿，把手机也摔了。还有一次，他偷钱给自己买游戏装备，爷爷发现后当下就教训了他，但还是觉得力度不够，于是告知了远在北京的父母，结果父亲在电话上狠狠骂了他一顿，母亲则请假回家专门管教他。小石爷爷说，自己平时也没少说孩子，但是“拿不住他”，也知道要管，但又感觉无从下手，主要是“他不听你的”。

四、教育权威缺位：易养难教的结构性原因

已有研究通常认为，农民家庭隔代教育很容易造成“有养无教”的问题。笔者调研发现，之所以产生这种“无教”状态，并不完全是因为祖辈不教育，而是由于在代际分工又分权的家庭结构下，农民家庭很难确保合法性权威在场以及教育权力集中，难以形成教育权威。

（一）家庭教育及其权威建构

家庭教育可以简单区分成“养”和“教”两部分。养主要完成基础养育，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层面的照顾。教主要完成社会化训练，包括学业、社交、行为、三观等社会化层面的指导、规训与管教。大部分家庭在教养上都会形成分工，教育者主要负责“教”，养育者主要负责“养”。养育者未必可以成为教育权威，而教育权威未必需要全程参与养育。

理想状态下的家庭教育实践，能够以教育者为主导，孩子、教育者、养育者三大主体之间形成稳定而良性的互动关系。其中，教育者和孩子之间建立权力关系，是公认的家庭权威，养育者大都与孩子建立亲密与情感关系，维护前者的权威。这种配合有许多表现方式，比如传统的“严父慈母”，现代城市家庭的“严母慈祖”[13]、“虎妈猫爸”[14] 等。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权威的建构，需要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互动中进行。

实际上，权威的建构必然涉及权力与认同、支配与服从。在父母是先赋的合法性权威的情况下，孩子对父母有着天然的认同。因此，教育权威树立的关键在于孩子的服从，即解决权力的有效性问题。而权力的有效性取决于沟通及其方式。有学者发现，沟通影响着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通过亲子沟通、家校沟通、家长之间沟通，各类资本才得以渗透到儿童的生长环境中[15]。而消极拒绝、溺爱和家长态度不一致这类沟通方式都有负面作用[16]。分析可知，拒绝、溺爱和不一致背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家长是否积极与孩子互动，二是互动时家长是否拥有不被破坏的权威。前者涉及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家长在场；后者涉及家长之间的关系，需要权力集中、意见一致。

也就是说，合法权威在场与权力集中共同决定着权力的有效性。在场需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日常互动作为基础，权力集中则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理想状态下教育权威的建构往往需要同时满足在场和集中两个条件。其中，教育权威要“扮黑脸”，其他人“扮白脸”。没有“黑脸”，家庭就有养无教；没有“白脸”，“黑脸”的权威也很难成立。如果黑脸唱戏白脸拆台，家庭教育就会陷入混乱。

（二）新三代家庭结构与教育权威缺位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普遍形成了“新三代结构”[17]。其中，祖辈和父辈“不分而分”[18]，祖辈留在乡村半工半耕照顾孙辈，父辈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从广义的家庭发展角度来看，这一安排是农民家庭的最优发展策略，既能扩大生产，又能完成家庭功能。但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这一结构恰恰不利于形成家庭教育权威。一方面父母与孩子之间长期缺少互动，另一方面

代际之间也很难建立配合关系，最终导致农民家庭教育权威的缺位。

具体而言，首先，父辈外出祖辈留守的代际分工结构，使得具有天然合法性权威的父辈很难保持教育在场，自身权威流于形式。而长期作为“代管者”负责养育的祖辈，即使想进行教育，也因为缺少合法性身份的支持而很难具有权威。父辈管不着，祖辈很难管，使得家庭教育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小秦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因为忙于生意，两人平常很少跟孩子联系。久而久之，小秦和父母之间的话越来越少，父母打电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非就是叮嘱他吃好、好好学习、听奶奶的话。有一次父母回家，小秦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耍了小性子，父母便说了他几句。没想到小秦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觉得父母平时又没有管过他，有什么资格说他。小石就更加典型，他说自己很怕父亲，因为会打他。但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他因惧怕而收敛行为的时间并不能维持多久。现在小石已经形成了习惯，父亲不在就无法无天，“大不了就是打一顿”，反正父亲总是要出去的。面对这样的小石，爷爷奶奶都很无奈。有一次小石找爷爷要手机，爷爷不给并让他去写作业，结果小石当即开始哭闹，声嘶力竭。爷爷只得用小石爸爸压他，没想到小石突然面色涨红青筋暴起，整个人无法自控。自此以后，爷爷再也不敢惹小石，生怕孙子出问题自己没办法交代。小石反倒因此有了威胁家人的新理由。小新爷爷和孙子的“斗争”经验就更丰富了，他作为代管者深感自己说话没有分量，看着越来越不服管的小新只能垂头叹气。

其次，即便家庭想要填补这一真空，分权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也使得教育权很难集中，代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配合，权威树立仍然困难。与传统家庭不同，尽管两代人共同承担孙辈教育责任，但新三代家庭中没有家长式的集权人物，两代人都拥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谁也不当谁的家”，形成了分权式权力格局。这使得，第一，孩子出问题时没有公认的权威人物能主导并组织家庭成员进行管教。第二，祖辈的付出更多的是出于责任的支持，而非出于依附的义务，因此在参与管教时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不必事事随着父辈的意思。这既可能调动起祖辈的教育主体性，也很可能导致父辈难以有效调动祖辈，甚至造成管教的混乱。第三，两代人在时空上的分离会进一步加剧配合上的困难。总之，由谁管、怎么管、听谁的都成了问题，两代人很难形成管教默契，甚至双双退出，消解了家庭教育。

小新爷爷说他的儿子儿媳“心大手大”，对孩子的事很少过问，但他却是个爱操心的人，惩罚孙子也从不心软。他认为管孙子和管儿子没什么区别，既然带孩子就要好好管。而小高奶奶则要粗糙很多，两年前她带着两个孙子进城读书，但对孙子看电视玩手机不写作业不吃饭等行为从不多加管教。前段时间小高成绩下降，哥哥在学校违纪，父亲得知后非常生气，回家后大发雷霆。但小高奶奶还是觉得看孙子耽误自己上班，还不能出去打牌散步，那些作业自己又看不懂，于是花钱给他们报了托管班。为了少生气，她干脆连吃饭也让孩子自己解决了。

相比之下，小安家的父辈在教育上的参与度更高，但也未能完全掌握教育权。小安妈妈时常感觉很难跟公婆沟通，“就算说了他们也不会理解，反而生事”。比如她会给孩子定时定量吃营养品，但祖辈觉得何必那么较真；她一定要监督检查孩子的作业，祖辈却认为小孩子的作业差不多就行了。有一次小安妈妈教训小安，爷爷奶奶听见后争相进来护孩子，反而让管教无法进行。小石家的情况就更复杂，父母虽然在北京，但两人并未在一处上班；祖辈虽然在家，但爷爷不定期外出，只有奶奶平时在家，四个家长在时间、生活空间上很难有交集，遇到问题也很难及时沟通协调，配合起来非常困难。尽管父母对小石特别上心，这几年常常请假专门回家管小石，但他们越是用力，小石的情况反而越糟糕。小石爷爷一开始还操心，后来发现自己越操心越乱还不落好，干脆不操心了。小王家则出现了明显的退出，爷爷因为年事已高，这几年在体力心力上明显跟不上，对孙子的唠叨比过去少了很多，随便他们折腾。他一心想让小王妈妈回家，自己也好晚年清净，但小王妈妈认为孩子已经长大，自己就算管也未必有效果，不如就这样随孩子去。

综上，父母作为合法权威长期不在场，教育权威流于形式，而相对独立又高度分离的两代人

又很难将教育权集中起来，相互之间也无法有效配合。权力真空与配合困难相互强化，最终导致家庭教育权威建构的失败。

五、授权、让权、转移：农民家庭的教养策略调整

通过合法权威是否在场和教育权力是否集中，可以进一步将家庭教育划分成教养合作型、易养难教型、教养混乱型和有养无教型四种类型。事实上，农民家庭很难形成教育权威，大部分家庭教育都属于后三种。对此，农民家庭做出了灵活调整，试图通过授权、让权和转移三种方式寻找和重建权威。

（一）农民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

有学者按照祖辈参与来划分抚育类型，比如按照父辈转让和祖辈替代程度的划分[19]，按照参与多少的划分[20]。而一般研究对教养方式的划分有很多种，比如，按照沟通方式区分为说服、民主、鼓励、宽容和保护、包办、溺爱、不管不问[21]；按照影响区分为正向与负向[22]；按照管教方式区分为“温暖、干涉、否定、严厉、不管”[23]，“纵容、独裁、权威型”[11]，“守旧型、纵容型、身教型和民主型”[5]等。

事实上，在两代人共同参与教育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子代教育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祖辈的参与度或者家庭表现出来的教养方式，而在于家庭教育权力由谁掌握、如何行使。从权力有效性来看，合法性权威是否在场决定了基础性的互动关系能否建立，而教育权力是否集中则决定了权力的实施能否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配合与支持。由此，可将家庭教育划分为四种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家庭教育类型

教育权力集中性 合法权威在场性	在场	不在场
集中	教养合作型	易养难教型
不集中	教养混乱型	有养无教型

可以看出，教养合作型是理想的家庭教育类型。这类家庭不仅能够确保合法性权威的长期在场，同时也能通过合作将教育权力集中于一个主体，其他成员进行配合，以此来保证教育的质量。上文提到的传统家庭中的“严父慈母”组合，以及现代城市家庭常见的“严母慈祖”“虎妈猫爸”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农民家庭因其特殊的拆分式结构而很难形成理想型，家庭教育大都属于后三种类型。首先，易养难教型家庭的教育权威虽然集中在父辈手中，但却因其长期不在场而流于形式，祖辈虽然在场却没有管教的合法性，比如案例中的小石家、小高家。其次，教养混乱型家庭虽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场，却很难将权力集中起来，不仅无法得到祖辈的有效配合，甚至可能被祖辈影响，教育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比如小安家。最后，有养无教型家庭父母既不在场又不集中权力，完全靠祖辈的自主与自觉，最终很可能消解家庭教育，比如小新家、小王家以及小秦家。

（二）授权、让权、转移：家庭教养策略的调整

对于家庭教育问题，大多数家庭不会视而不见，他们会根据家庭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在权威在场性问题和教育权力集中问题上寻找平衡。从笔者的经验上看，父辈授权、祖辈让权和权力转移，成为家庭常用的三种调整手段，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家庭教养策略。

首先，父辈授权是指在不改变家庭基本分工、权力以及生活结构的基础上，父辈将教育权完全交给祖辈，在管教问题上听从祖辈安排，并且退居幕后支持祖辈管教，形成“严祖慈母”的教养分工。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不必改变家庭分工，也不会影响家庭收入，但劣势在于祖辈的负担过重，在资源、精力、情感、心理能量等各方面都要全面投入，劳心又劳力。另外，教育不当很可能导致孩子对家庭以及亲子关系的认知出现偏差。

自从小秦一年级转学进县城后，父母就将教育权力交给了奶奶。受托于儿子儿媳，小秦奶奶深感自己责任重大。除了生活照料，她认为“学习、做人都要观察、要教”，所以会给孩子报辅导班，限定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间，教他怎么用钱，还会特别留意小秦平时的表现，包括他的状态、每天的所见所感等。尽管和孩子非常亲密，但奶奶管教起来还是有阻力，因为“知道你不是父母，就不听。孩子怕父母，不怕爷爷奶奶”。

即便如此，奶奶还是会严加管教。有一次奶奶打了小秦，小秦很委屈，给父母和爷爷打电话告了一圈状，结果大家态度一致，告诉他“你为啥不想奶奶为啥打你”，最终小秦给奶奶道了歉。除了这些，最累的其实是协调自己、孩子与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奶奶要时刻向孩子解释论证，为什么他的父母为他好却不在家，为什么他要听奶奶的话，以及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另一方面，她还要时刻留神亲子关系。当奶奶发现小秦和父母没话说，甚至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后，她主动建议儿媳妇多给孩子买东西寄回家，了解孩子的喜好，这样也“有个由头加深感情”。付出了这么多劳动和心血的奶奶，还是不得不面对孙子见了父母就将自己抛在一边的现实。奶奶坦言自己会心酸，也会心累，但“自己能替他们担点就担点，这也是为了他们（儿子儿媳）以后不作难”。现在，奶奶才是家里的教育权威，父母则成为孩子的玩伴。奶奶说，放假过年时小秦总是缠父母，“图新鲜一样的，好吃好玩的都有，但一到晚上睡觉就要找奶奶”。对小秦而言，父母的好遥远而易逝，奶奶的好才真实踏实。

其次，祖辈让权是指祖辈主动通过让步来将教育权责明晰化，自己退居幕后只负责照顾，将父辈推向台前负责管教，两代人之间形成教养分离、“台前幕后”[7]的教养分工。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可以由父母亲自管教，减轻了祖辈的责任和心理负担，但劣势在于必须调整家庭分工，父母至少一人必须返乡，难免影响家庭收入。

小石家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2019年春节，爷爷直接提出了小石的教育问题，想让小石父母回家管孩子，“再不管就要废了”。小石父母也有同样的考虑，但是迫于房贷、车贷的压力，他们还是决定再出去一段时间，让祖辈再坚持坚持。其实从三年级开始，小石就已经不听话，而且成绩下滑明显，意识到自己管不了孙子后，祖辈从那时起就开始让权。小石爷爷坦言自己能力有限，本来也应该由父母来管。于是，每当小石做错事，爷爷奶奶就把小石父母搬出来压他，一开始是吓唬，后来真的打电话给儿子或儿媳，再后来就需要儿子儿媳频繁请假返乡来管。到现在，小石甚至故意犯错，只是为了让妈妈回家。不久前，小石听到奶奶跟爷爷抱怨，意思是让儿媳妇回来管小石。但是小石妈妈又有其他考虑，一来家庭经济压力的确大，返乡意味着每月7千～8千的收入变成1千～2千；二来她并不自信能管好小石，也对要处理与公婆之间的关系感到麻烦，想至少等到房子装修好后再回家。现在，小石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家庭正处在转变的十字路口，向前一步就可以形成台前幕后的教养分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不久之后小石母亲便会返乡带小石在县城生活，祖辈彻底退居幕后。与此相似的是小安家。小安的妈妈和爷爷在买房上已经有了共识。他们准备等小安上小学就进城，妈妈在城里边上班边带孩子，祖辈留在农村。

最后，权力转移是指祖辈和父辈将教育权力转移出去，外包给学校或者托管班。如此一来，家庭分工不用改变，祖辈负担也可以减轻，孩子管教问题也能得到暂时解决。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可以减轻所有家庭成员的教育压力，但劣势在于，一来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二来这种权力转移的本质是推卸责任，未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小王爷爷两年前和儿子儿媳商量后，将小王和姐姐转入县城私立学校。虽然小王家距离乡村学校非常近，步行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但每天要接送，操心给孙子做饭、洗衣，还要忍受两个孩子的闹腾以及坏习惯，爷爷感到非常疲惫。转学后，爷爷轻松了不少，两个孩子全日制寄宿，每十天放假一次。为方便接送，爷爷从自己的养老钱中拿出8千元买了一辆电瓶车。学费和生活费则由儿子儿媳负责，平均每个孩子每年花费9千元左右（学费住宿费每年3600元，生活费每月600元）。虽然祖辈和父辈轻松了，但小王和姐姐并没有因为转学而转变习惯，反而因为平时学校管理严格，各种不良习惯在假期出现了报复性反弹，比如吃辣条、各种膨化食品，喝汽水，玩手机看电视，熬夜赖床等等。小王的老师说，小王基础实在太差，现在老师教他根本听不懂，已经六年级却连三年级的知识还没有掌握，现在只能凑合跟着，不违纪不惹事就可以。类似的还有小高，小高父母原以为将两个孩子送进县城至少比留在农村要好。可是没想到，进城后诱惑更多问题更大，小高每天看电视玩手机，哥哥则出现

了严重的叛逆和违纪。对此，家庭的解决办法是继续转移责任，花钱送托管和辅导班。小高的班主任对此表示：“家长总有一种让老师替他管孩子的想法，这怎么可能呢?”

综上，虽然很难形成城市家庭的“严母慈祖”教养模式，但农民家庭有望形成“严祖慈母”和“台前幕后”模式。其中，“严祖慈母”通过父辈授权祖辈代管来实现，“台前幕后”则通过祖辈让权父辈返乡来实现。而权力转移策略，其实是放弃了教育权力，消解了家庭教育，最终难免让家庭沦为有养无教的荒地。

六、反思与讨论：农民家庭教育的内卷化

与城市家庭不同，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需要外出务工来扩大家庭生产，家庭拆分是生活常态。虽然难以保持完整，但这样的家庭分工与结构的确是城市化背景下的相对最优发展策略。面对越来越突出的子代教养问题，农民家庭很难两全，不得不在保收入和保教育之间进行取舍。事实上，不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文化资本上看，农民家庭所拥有的教育资源都比较弱势。当前的教养策略调整，其实无益于农民家庭教育资本的增加，反而是对既有家庭资本的进一步内卷和消耗。

作为家庭的发展希望，农民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越来越有不计成本的趋势。从教育观念转变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好事。但如果从家庭发展和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却未必是好事。首先，如今教育投入的高成本、长期性以及不确定性无形中增加的家庭风险，将原本就弱势的农民家庭进一步推向了发展的边缘。其次，当前县城以及乡村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教育市场的不规范，变相抬高了教育资源的获得门槛，却并没有真正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使得“进城上学就是换了个地方，还是原来的农村老师教原来的农村学生，但是变贵了”。另外，大量农村学生进城，直接导致县城学校出现大班额、管理难、师资紧张等新问题，反而影响教育质量。

总之，农民家庭教养策略的调整，既体现了农民家庭的灵活性，展示出家庭发展的能动性与活力，但同时也是家庭因教育而内卷、而负重的信号。家庭教育权威缺位固然是农民家庭难以避免的结构性问题，但同时也应认识到权威补位所必然需要家庭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不仅仅是家庭教育问题，更是家庭发展问题、学校建设问题、就近城镇化问题以及教育资源的公平与均衡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化改革、政策性调整以及公共服务的建设完善来帮助农民家庭降低发展风险，实现平稳过渡。

参 考 文 献

[1] 杨华.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6）：86-98.

[2] 雷望红. 中国城乡母职形象何以分化——“教育家庭化”中的城市“虎妈”与农村“猫妈”[J]. 探索与争鸣，2020（10）：148-156，160.

[3] 蒋宇阳. 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J]. 城市规划，2020，44（1）：35-43，71.

[4] 苏运勋. 隔代陪读：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J]. 北京社会科学，2019（9）：66-75.

[5] 许传新. 农村隔代照顾研究状况及其趋势[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37-46.

[6] 朱灵艳. 个人成长期父母缺位与其成年后社会交往行为之间的关系[J]. 学前教育研究,2016(10):29-37.

[7] 王兆鑫. “台前幕后”：农村家庭儿童抚育过程中祖辈、父辈的职能分工和代际关系[J]. 社会建设，2020，7（2）：54-65.

[8]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2013，35（3）：37-49.

[9] 段成荣，赖妙华，秦敏. 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7（6）：52-60.

[10] 张爱华. 农村中年女性的温情策略与家庭关系期待——对河北上村隔代照顾实践的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2015（5）：19-28.

[11] 张兴慧，董爱波，王耘. 母亲与子女主观幸福感的代际传递：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1）：163-165,170.

[12] 杨华，王会. 中国农村新“三代家庭”研究[J]. 中国乡村研究，2020（1）：128-161.

[13] 肖索未. “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14，29（6）：148-171，244-245.

[14] 杨松山. 从《虎妈猫爸》看现实儿童教育理念的冲突与融合[J]. 当代电视，2015（8）：9，20.

[15] 池丽萍，俞国良．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机制：资本和沟通的视角[J]．教育研究，2011，32（9）：22-28.
[16] 王雁，赵静．父母教养方式对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影响[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14，15（2）：60-64.
[17] 张雪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5）：120-126.
[18] 陶自祥．分裂与继替：农村家庭延续机制的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19] 郑佳然．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1）：113-119.
[20] 陈静，白琳琳，栾文敬．“断链后的再链接”：儿童社会保护视域下的乡村家庭隔代抚养模式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8，27（1）：74-82.
[21] 薛慧，于倩，贾波，等．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智力发育和非智力因素的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1998（4）：3-5.
[22] 张奇勇，李庶泉．家庭教养影响儿童同伴关系的路径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2）：240-243.
[23] 刘朔，刘艳芳，王思钦，等．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5（4）：87-93.

Authority absence and strategy adjustment——research on the children rais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NG Xuqing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Family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subject and resource，but also a matter of power.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teach the childre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es in the abs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uthorit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new three-generation family structure is difficult to cultivate educational authority. Among them，the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akes it difficult for legitimate authority to be present，resulting in a power vacuum in education；the decentralized family power structure makes it difficult to centralize the educational pow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ordination. As a result，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family education：easy raising and difficult teaching，chaotic raising，and raising without teaching. Faced with the problem，the family adjusted the educa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parents and the power transfer by the grandparents，two new models have been formed，namely，the "strict grandparents and loving mother" and the "in front of stage and behind the scene". There are also families who have given up family education through power transfer，turning the family into a wasteland with no education.

Keywords：Farmer family education；New generation farmers；Education authority；Education strategy

（编辑：程俐萍）